

前门九章

肖复兴

繁华平广的前门大街
就从正阳门开始，
笔直向南，好像通到
中国的心脏。

——李健吾

作为前门大街的象征，前门楼子（也就是正阳门）是明正统二年（1437年）建的，它位于帝中轴线的北边，除了皇宫、天安门，就要数它了。

小时候，在前门大街，觉得最热闹的地方在大栅栏东口，往里面走就是大栅栏商业老街。那里永远人流如织，路口两侧分别是大通食品店和公共文化用品店。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从永定门城楼进入了北京城，前门大街出现从未有过的热闹。据说，第一拨赶到前门大街欢迎解放军的人群，是从大栅栏里涌出来的那些店铺里的学徒和伙计们。因为他们离前门楼子近，便也就近水楼台，早早地跑出大栅栏东口。当然，除了看看热闹，更因为他们对新北京充满向往。在解放初期，政府对大栅栏的商家实行了有名的“四马分肥”的政策，即店里赢利所得，一份上交国税，一份店家留存为日后发展，一份店家自得，一份为伙计学徒的工资。一般伙计月工资五六十元，骨干八九十元，基本和当时一般的干部相等，那时我父亲为行政20级的小干部，月工资70元。

大栅栏东口路西的公共文化用品店，是我常去的地方，觉得是前门大街最有文化的两处之一，另一处是前门报社社。

报社社，在我家住的西街西打磨厂西口，紧挨着大北照相馆。很小的一个店，窄窄的一条，如同削削的金糕条。别看店小，全国的文学杂志样样俱全，全部开架，任人随便翻看。从小学到中学，一到星期天，我就到那里看杂志，一看看半天，没人管，站在那里也没觉得累。它成了我的阅览室。河北的《蜜蜂》，辽宁的《芒种》，青海的《青海湖》，都是在那里看到的。一直到1966年，在那里买到最后一期的《儿童文学》。它关门了，我的青春结束了。

公兴是一家老店，开业于1900年，以前专卖纸张，包书皮纸，做手工的电光纸，中秋节画玉兔的月光纸，春节写春联的大红纸，我家所有糊顶棚的毛刀纸、大粉纸，橱窗内的高梁纸，都是到那里买的。改为文化用品商店，是后来的事，扩大了经营范围，与时俱进还卖过照相器材。改店名是后来的事。不过，只是昙花一现，店名很快又改过来了。改不改名，和我们关系不大，街坊们一直叫它“公兴”，亲切得像个昵称。

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冬，那里卖处理的日记账，里面的插图印的全是样板戏的剧照。很便宜，一角多钱一本，我一口气买了六本，回家全部抄录了唐诗宋词和元曲小令。

公兴老店至今健在，只是门面大变。门外墙上它有它的老照片，对照着它的前生今世，举头已是千山绿，不觉已过百年。

通往肉市胡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巷口立个写着“广和剧场”的牌坊。如今，牌坊重建，簇新得让人恍如隔世。以前，巷口北是永义合乐器店，南是通三益食品店。永义合店很小，往里面凹进一截，店前轩豁；通三益紧邻大街，高高的台阶，宽阔的橱窗，很是气派。两厢对照，宛如一仆一主对峙。

小时候，我吹笛子，花一毛多钱买的第一把笛子，在永义合。以后，每一次买笛膜，都是在那里。笛膜很便宜，几分钱一袋，装在精致的纸袋里。我上高中，不再吹笛子了，那纸袋还夹在我的笔记本里，舍不得丢掉。

通三益是家干果老店，开业在清嘉庆元年（1796）。卖得最出名的是秋梨膏，据说是宫廷秘方，入秋之后止咳专用，名震京城，就连当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给咳嗽久治不愈病人开的方子，都有一帖是通三益的秋梨膏。

不过，我们一群孩子对秋梨膏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中秋节前，店里的中心位置上，摆出一个大如车轮的月饼，四周用菊花和鸡冠花围着。是那种提浆月饼，皮上刻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据说，这个巨大无比的月饼一直摆到中秋节过后，店家就把这块大月饼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免费分给客人品尝。那些天，我几乎天天往那里跑，可惜，一次也没有赶上过这样的好机会。

街西紧邻中原照相馆有家亨得利钟表店。那时候，手表是奢侈品，国产表要票券，外国表要高

价。我在北大荒务农，弟弟在青海油田当修井工，有高原和野外工作的双重补助，收入比我高好多，他说赞助你多花点钱买点进口表吧。可进口手表也不那么好买，来了货后要赶去排队，去晚了，就买不到了。

我中学同班同学张俊成，分配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作，每年从北大荒回家探亲，我们都要聚聚，叙叙友情。听说我要买表，他自告奋勇说这事交给他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要去赶早排队，得请假。他对我说：“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谁让我在北京呢！”

他家住花市头条。为万无一失，买上这块表，天还没亮，他就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赶到亨得利钟表店排队，排在了最前面，帮我买了块英纳格牌的手表。那天，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到了早晨，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

那时候，他自己还没有一块手表。这让我很过意不去，他对我说：“你在北大荒，四周一片都是荒原，有块手表看时间方便。我在北京，出门哪儿都看得到钟表，站在我家门前，就能看见北京火车站钟楼上的大钟，到点儿，它还能给我报时呢！”

那是1969年底的事情。五十二年过去了，亨得利店没有了。英纳格老手表还在。

1974年春，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当老师，前门大街的店铺变化很大，越往南越大。一般人逛前门，逛到大栅栏口附近，很少再往南走，南面的店铺为吸引顾客，只好变着法子花样翻新。南面路西的几家老店打通，连成一家，变身家具店。

我看看一个书架，一米四高，铁制，墨绿色，22元。渴望一个书架，是童年的一个梦。那时候，我可怜的本本书，委屈地放在只有区区两层的鞋架上。读初一时，一次到同学家，他父亲是当时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周游先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书架，顶天立地站在那里，很是羡慕。等到第一个月发了工资，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家具店，买下那个书架。那时候，我的工资四十二元半。

书架买好了，却笨得无法扛回家。借家具店的电话，求助一个中学同学照顾。他说没问题，等着我吧！很快就骑着自行车来了，然后一只手持着书架，一只手扶着车把，游龙戏凤般飞驰在前门大街上，像是在演精彩的杂技，引来众人的目光，硬是把书架驮回家。那一日黄昏他骑自行车的潇洒样子，是一条前门大街从来没有过的风景。

这条老街的中段，有一家新华书店儿童门市部，它的北面是从上海迁来的老正兴餐馆，南面是普兰德洗染店，三家店都是新店，都一直坚持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新华书店儿童门市部，专卖儿童图书。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常常他到这里买书。很多书都是从这里买的，买到了他渴望的《少年百科全书（生物卷）》，厚厚的一大本抱回家，像是意外得宝。

小学四年级，一次作文，老师布置了这样一个作文题目“第一次刷白球鞋”。娇生惯养的孩子哪里刷过呀！他挺认真，为写作文，第一次自己刷起了白球鞋，竟然把一盒白鞋粉都用光了，也没有刷好鞋。便让妈妈再买一盒白鞋粉，他要接着刷，接着写。那一天下午放学之后，我和孩子先到新华书店儿童门市部，买几本书，然后等妈妈。我们两人坐在书店门外的台阶上等，等了半天，他妈妈也没来。准是下班晚了，路上又堵车，我安慰孩子，顺便问他这篇作文打算怎么写。好在买的有新书，他坐在那儿看书。一直等到日落黄昏，一街车水马龙，人流来往。三十年时光过去了，还记得夕阳的光芒在孩子手中的书页上，萤火虫似的一闪一闪地跳跃。

2004年前后，为写《蓝调O城》一书，我常去前门一带转悠。有一天，我在大北照相馆门前等老街坊，一起回西打磨厂老街，看见马路牙子旁停着一辆带棚子的三轮车，专门拉外地客人胡同游的。拉车的是个中年男人，腿有些残疾，冲我说：你不是要看胡同吗？我拉你看肉市里的正阳楼，我就是正阳楼里出生的。我有些奇怪，正阳楼是清道光年间开的一家老饭庄，号称京城八大楼

之一，他怎么会是在那里出生的呢？是真的，还是骗人，只是为了拉客人？老街坊没想到，我走了过去，和他搭讪起来。

他很高兴，对我敞开了话匣子，告诉我：“我是1953年出生的，正阳楼解放前就关张了，解放以后都住上人家了。我们家就是刚解放的时候从铺陈市搬来的。现在，正阳楼的后面已经拆了，盖成停车场了，正阳楼还剩下前脸的三个窗户，我带你去看看！”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正阳楼。他还是顽固地要拉我上车，带我逛逛去。一丝丝怜悯，又袭上心头。

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见我按着牛头不喝水，就是不上车，自己一溜一拐地上了车。有点儿生气，一屁股坐了上去，眨巴着眼睛，对我说：“我见过你，总到打磨厂来，还拿着照相机拍照，对不对？”

他一下子笑起来，笑得那么开心，有些天真般的诡谲，好像掌心早握着他想要的一张牌，摊开来一看，只有让我吃惊的份儿了。他是真心地想帮助我，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关于老北京的一切。而我刚才一直对他怀疑，真有些惭愧。

老街坊们来了，我向他一再道谢后向打磨厂走去，他冲我喊道：“我妈就住在打磨厂××号，她今年七十三，知道的比我多，你可以找她，她姓张。”

前两天，看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的短信，说“人活着一定要有个心爱的去处，与人间烟火交融一起”。说得真好。几次搬家，离前门大街越来越远，还是常去那里走走。那里便是我的心爱去处。

那里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小时候，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里专门卖旧书。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一位朋友在那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一套十卷本《鲁迅全集》，花了二十元买下送我。1995年年初再去，只卖新书。我在那里买到一本《话说前门》，心想在前门买到一本小说前门的书，也是缘分呢。书的作者王永斌，以前没有听说过，但书写得非常翔实，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对前门一带的历史与地理做如此详尽田野调查式的书写。看书中前言介绍，王永斌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一直在前门中学教历史，直到退休。他对这一带很熟悉，放学之后，常常骑着自行车在前门附近转悠，遍访老店铺和老街坊。这样的书，不是仅靠材料和想象便倚马可待的，我因此对他产生敬佩之情。

2005年秋天，中央电视台找我，要拍摄西打磨厂老街，我对导演说，拍西打磨厂，乃至拍整个前门，你们应该找王永斌先生。导演告诉我，“他们已经找了王永斌先生，王先生推荐了您，我们找您！”导演说这个星期天我要去看王永斌先生，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拜访。

我在东城一个大杂院里见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年过七旬，我先迫不及待地讲起十年前买他的《话说前门》的情景，和他相约一起到前门大街逛逛。一下子，前门，在他的眸子里那么清晰地辉映。

2008年初，重庆旧帜的九O龙斋，派人找我，让我带他们到前门指认老店旧址。那时，前门大街

正在忙碌整理的最后阶段，路口被封。我们进不去，好说歹说，方才放行。

我指着油饰一新的五排楼南一座弧形小楼，告诉九龙斋人，这便是九龙斋旧址。他对着它噙里咄啦照相。我告诉他，九龙斋最早在前门的瓮城里，民国时瓮城拆除后，搬到这里。

酸梅汤，老北京以信远斋和九龙斋最出名。读金云臻先生《短订琐忆》，知道这两家的酸梅汤各有讲究。九龙斋的，色淡味清，颜色淡黄，清醇淡远；信远斋的，色深味浓，浓得如琥珀，香味醇厚。只不过，九龙斋不如信远斋的年头长。解放以后，九龙斋早不卖酸梅汤，改叫九龙斋鲜果店。弧形的小楼，倒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不过，肯定不是九龙斋从瓮城迁到这里来最初的样子了。

前门大街整修之后重新开街，它的对面，是新建的星巴克咖啡馆。夏天，门前摆满咖啡座。我心想，要是九龙斋还卖酸梅汤，一中一西，可以唱对台戏呢，该是一道有趣的景观。

2018年的深秋，北京青年报组织了一次活动，让我带着一帮年轻人逛前门。我们约好在五排楼前聚合。人来了二十几位，有人拿着手机，架起支架录视频，准备直播。这是年轻人爱耍的把式，我听他们的调遣，活动本身也是一种乐嘛。而且，让更多的人知道前门，了解前门。

我走到街中间，身后是前门楼子，脚下站的位置，应该是以前的玉带桥，小时候，桥还在，桥下的护城河也还在。汉白玉的桥旁摆满小摊，卖些零食。秋天这时候，卖得最多的是糖葫芦和炒栗子，重阳节前，卖插着小旗儿的花糕。有轨电车，叮叮当地响着，只是没有如今车身涂抹得那么鲜艳。那时候，五分钱一张车票，可以直穿前门大街，一直坐到永定门。

想想，我和前门前后缘分有七十余年，前门大街的风云变化的历史，足以像当年埃米尔·路德维希为尼罗河写传一样，写成一部大部书。路德维希把尼罗河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把它地理融化在历史的变迁之中，把它写成了一个有血肉有情感的人。我们也可以把前门大街写成这样一个有血肉有情感的人，让他走向中国的心脏。

架着手机的镜头对准我和主持人——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开口刚刚介绍完我，几个穿着藏蓝色制服的保安就走过来，阻拦住我们，说这里不允许拍摄。我们只好退回到街边，参加活动的年轻人中有人手里拿着我的新书，扬着书冲保安说：我们是搞活动，走前门，也是宣传老北京文化呢！还指着书不住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心想，谁知道我呢？能管什么用？几个保安不说话，走了。不一会，笑眯眯地走过来一个保安，说是他们的头儿。看他那和善的样子，以为可以让我们拍视频了。谁知，他说：“有规定，这里游人多，都在这里拍视频，就没法管理了。”说完，他手里居然也扬着一本书，让我给他签名。也留个纪念！“我知道你，读过你的文章。”他对我说，依旧笑眯眯的。大家一听也都笑了起来。活动有了个意外的小插曲。前门大街多了点儿笑声。

2021年4月22日于北京细雨中

如果当年我没有考上学校，端上所谓的“铁饭碗”，我的父母为我设计的道路很可能是当裁缝或木匠，而我的选择很可能是后者。

因为在我看来，木匠所做的是多少有些创造性的工作，他打制一个物件，如果加进他的巧思或者说匠心独运，很可能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些沉甸甸的浑然一块的木材，在他的手里变成便利的工具，还可能变成栩栩如生的动物、玲珑精巧的玩具，这多么有意思啊！难怪中外都有木匠出身的人最后成为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如齐白石、安徒生，都是世人共知的大师。

我当然不敢说我如果做了一名木匠，将来也会成为一名什么方面的大师，但谋生大概绰绰有余；甚至在谋生之余，雕琢几件小玩艺把玩把玩也不无可能。

在我的前面，就有好几位校友书没有读过，做木工却比较成功的范例；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做出的活儿是否算得上工艺水平很高，但是很漂亮的器具则无疑。

在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略大一两岁）当中，第一个成为木匠的，应该是齐红星。他的父亲是我的老师，最初还是一名公办教师，不知怎么被贬为民办教师，这在当年也不是多么稀奇的事。当了民办教师，收入骤减，家庭困顿，加上齐老师身体也不好，而家里孩子又多，想想看，作为长子的齐红星哪有心思念书。于是，勉强把小学糊弄毕业，连初中都没有考上，就回到家里去搞农业生产。他的家离我们村不过两三里地，虽相隔不远，但从此信息全无。几年后，我忽然见他出现在我们的村头，身上背着那特有的敞口工具箱，走到住在村头的那户上海下放人家，我才知道他已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木匠。过了一两天我到上海人家去看热闹，见这家的地板上铺开了一地的木板木块，还有刀锯、弹簧、皮革之类，而齐红星正握着一把斧头，在砍削一块木头，砍一会儿还熟练地眯起一只眼睛，看看是否成直线。他见我来了，笑了笑，露出了一颗虎牙，问我：“你那还有什么连环画？”他做了木匠，竟没有改变看闲书的习惯，这颇赢得我的好感。我反问他有什么好书，他说没有什么，只有一册《呐喊》：“喏，就在那里！”我顺着他指示的方向望去，果然在他的工具箱上头躺着一本书。我奔过去把这本白封面印有鲁迅先生塑像的名著拿到手里，简直有一种在荒野里遇见一颗宝石的意外之喜！前不久，我还曾向高年级同学《阿Q正传》写的是是什么，这会儿，一整本小说《呐喊》都有了！我当然要借过来看看，而齐红星把手一挥，说拿去吧，不用还了。这真让我高兴莫名。这本《呐喊》也是我拥有鲁迅先生著作之始，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后来，我还去齐红星的劳动现场看过一两次，最后看到的是几只崭新的皮革沙发椅赫然摆放在那间土坯房中，真可谓蓬荜生辉啊，我不禁对齐木匠的手艺肃然起敬。到底是有慧根，在乡亲们几乎不知道沙发为何物的年代，他给这穷乡僻壤造出了这带有洋味儿的家什，岂不令人敬佩！可惜从此以后，我俩竟然再也没有碰过面。

我自己村庄里后来也出了一位年轻的木匠。他是我的堂兄，很可能还与齐红星做过同班同学，但他在初中毕业以后成为木匠的。他在初中读书时一度成绩很好，如果不是父亲年老体弱，他一放学就得做家务，一放假就得参加生产劳动，而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学习，他考上高中不成问题。但这只是假设，现实是，他初三那年，父亲一曝而逝，他要肩起家庭的重担了。他的母亲咬咬牙，决定让他去山里一户人家拜师学艺。一去三年，几乎没见到他人影；三年后，他下山了，

李成

却已是一位“满了师”的木匠，可以独立开展业务了。

他出师不久，正好我家翻盖新房，便请了他与另一位师傅做木工。在我家小院里，两位木匠摆开了战场，一切檩条、椽子，都经过他们量裁打里才能用上；一切门窗、户扇都由他们打制。那时我还在读初中，不能整日在家，只在中午和傍晚放学回来，才看到他们劳动的场面。只见他们有时在搭起的棚架上解木，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不停拉锯；有时他们在画墨线，眯着眼，把墨绳绷直在木料上，确定好后，就弹一下那墨绳，把墨迹留在木上；有时在凿卯眼，用尖锐的锛子剔得木屑纷飞；有时在刨木，木花在刨子下翻卷……总之是忙得不亦乐乎，我们相见，连话也不能多说，只是会意地一笑。他也曾是我们的孩子头儿，带我们打野战、拦水坝、采红菱；家境决定他要经常在星期天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打柴，每次挑着沉甸甸的柴担回到村里，还不忘给我们带山花山果。而更使我难忘的是，我在小学而他在初中读书时，有一次我们几个对供销社里出售的小说《铁道游击队》感起了兴趣，可是谁也没钱买不起，我们便商量凑钱买了一本，大家轮流看。我至今记得我们几个坐在草堆上，欢喜地打开这本新书的情景。

这次我家翻盖新房比较成功，完全得益于几位瓦工、木工把活做得细致、精工，使得此后二三十年，几乎没出过问题。而且，我这堂兄还用剩余的木材为我家打了两只水桶，那水桶箍得非常牢固。堂兄做的话就像他本人一样，敦厚结实，看起来有些笨，实则经久耐用。这在乡村颇得人好感，所以找他做活的人也不断，他因此很快改变了家境，变得殷实起来；而更重要的，他的敦厚坦诚，让他在一次出工时赢得主人的赞赏，并主动牵线把小姨妹介绍了他。不久，这个小姨妹成了我的堂嫂子，一转眼又生儿育女，家道兴旺，把我那受了大半辈子苦的伯母乐得逢人开口即受。我每次回乡，我这堂兄也欢喜过来聊天，偶尔还站到我的书架前挑几本书借走。尤其想不到的，他有一次竟然捧来一册《聊斋志异选注》，问我不要看，他还老实地承认他不太看得懂；我欢喜地收下了，其实，我也不敢说我家篇都能看懂，虽然我已是一个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现在，我的这位木工堂兄早已在县城里开了木匠铺，大约他的事业更加兴盛发达了吧！

我最后一次在家乡见到木匠干活是在我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一座小镇教书。与我搭档的一位同事要结婚了，据说请来一位木匠师傅，打制了一房漂亮的家具，我正准备去欣赏，忽然竟传来那木匠师傅指名想见我的消息。我很诧异，跑去一看，原来是他，我在初中读书时就认识的一位师兄。他的学习成绩其实不错，也考上了高中，但是那时高考体检严，他因为脖子有点扭着，自以为不会被录取，便自动退学了。我们都为他可惜。几年之后，我几乎把他忘记了，没想到他回乡做了木匠。这次相见彼此都很高兴；再看他的“作品”，果然是那么精致、雅洁，传统与现代风格融合，让人一看就非常喜欢。我们谈了别后的情况，再次令我诧异的是他竟然跟我谈到了写作，仿佛他知道我偶尔喜欢舞文弄墨一样。让我感到尴尬的是，他问到我一个比较生僻的“喏”字，我过去查过这个字的读音和意思，但是这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得告诉他，我知道台湾作家琼瑶本名“陈喆”，一边暗瞪脸红，心里感叹：这个木匠了不得呀！

“你推动木刨/像驾驶着独木舟/在那平滑的海上/缓缓漂流……”这是诗人顾城在《给我的导师安徒生》一诗中的诗句，因为他在下乡当知青时，也曾做过木工。确实，劳动神圣，有创造性的劳动更值得赞美！这使我想起吾乡的传说：凡是在外地做工到很晚才回家的人，在夜行途中，只要带有一件他的劳动工具，就可以教一切鬼物不敢靠近，比如木工，他们常常要走夜路的，如果感觉遇见了污秽之物，把手中的木尺剝剝或将斧头抡空砍一下，就会叫它们烟消云散！钜哉，连鬼神都不得不敬服神圣的劳动者！

木工小记

笔会

那束光

（油画）

李亚一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